目　录

抗战前后广西见闻 ……陆　诒（1）

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界 …… 冯英子（10）

回忆文化供应社 …… 万仲文（19）

所谓"面粉有毒事件"和新桂系迫走
　欧阳予倩先生的经过 …… 李　微（31）

北海斜阳岛的革命斗争…… 罗威(39)

坚贞留得万年心——记何香凝老人在桂林
　…… 魏华龄（48）

从抗日战争初期大别山的军事政治形
　势看我党统战工作的作用 …… 钟国松（53）

广西第一所中学 ……陆雄林 等（57）

回忆龙城中学…… 高天骥 等（61）

一九四四年桂林防守战 …… 郭炳琪（69）

抗战期间桂林七星岩八百壮士殉国
　纪实 …… ……陈兴让（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记北海中野事件 …… 陈汉流 (83)
南宁两次沦陷纪实 …… 邓维荘 (88)
抗战时期的白崇禧动态 …… 刘仲容 (96)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其人 …… 张义纯 (102)
桂系的和平攻势自绝于人民 …… 刘仲容 (114)
关于陈良佐在梧州被扣押时逃走
　　的经过 …… 左镜明 (123)

解放初从大陆逃到港澳的桂系军政
　　人员概况 …… 谢凤年 (125)
旧社会梧州“盲妹”的苦难 ……李翠群 等 (130)
解放前广西桂林特察里的概况 …… 谢凤年 (139)

对《广西文史资料》第七辑三点质疑
　　和订正 …… 梁烈亚 (152)

本刊稿约 …… (60)

抗战前后广西见闻

陆诒

我始终怀念广西，怀念广西的山水和人物。抗战前和抗战后我到过广西，当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抗战胜利之后，我是从柳州机场搭军用飞机飞返上海的。

一、初次到广西

记得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新闻报》派我到广西南宁采访中国科学社等六学术团体年会的消息。当时的广西，对蒋介石所控制的南京政府来说，算是一个半独立的省份。李、白、黄（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所统治下的广西，情况究竟如何，这是新闻记者所关心的，六学术团体年会开得如何倒还在其次。

从上海出发，同行者有中国科学社王家楫、卢于道和刘馥等，我们先坐轮船到香港，再从香港直接坐轮船到广西梧州。当时帝国主义还有所谓内河航行权，到梧州去的轮船也是挂英国旗的，由英国轮船公司经营。从香港到梧州，溯西江上驶，历时三昼夜。我们坐尾楼，舱位和船上的伙食都很好，就是旅客们一天到晚的赌博，吵闹不休，使人难以安睡。一到广西省境的梧州，即由广西省政府派员招待，换乘梧州到南宁的小客轮，沿邕江航行。

参加六学术团体年会的大部分人员到达南宁时，都受到

广西党、政、军和文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年会开幕前夕，省政府举行盛大宴会，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都亲自出席招待。这位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将军曾亲临省政府招待所——乐群社，走到我们每个人的住房拜访。他当时标榜广西实行“三自政策”，即政治上自治、经济上自给和军事上自卫。全省举办民团，所有各级机关的公务人员和大、中学校学生一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从实践来看广西“三自政策”的口号，所谓政治上自治和军事上自卫，是针对南京政府说的，而经济上自给则是骗骗人的。当时的广西还和广东的陈济棠相勾结，成立国民党的西南政委会，拥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古应芬为号召，同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李宗仁以大部分时间常驻广州，接纳各方人士，加强联络，而把广西的军政大权委之于白崇禧和黄旭初，于是许多人称李是一位专办外交的将军。

初次到广西给我难忘的印象是办民团、实行军训，走向全省皆兵，这对当时许多人主张抗日救亡也起鼓舞作用。尤其重要的，八年抗战中，广西出兵员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桂林与柳州两地也曾在战时发挥过基地的作用。

二、抗战初期的李、白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在“八·一三”以后的上海战场，我首先接触的广西军队是廖磊所统率的第七军，他们作战勇敢，纪律也比较好。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徐州，采访第五战区的战讯，当时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李宗仁、白崇禧以参谋次长的名义常驻五战区，协助李指挥作战。广西军队当时改编为五路军，在淮河两岸作战，而李、白在津浦线上所

指挥的部队，除了中央军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杂牌军。如东北军于学忠部队、西北军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部队，再如川军邓锡侯部队、滇军卢汉部队和韩复榘部下的孙桐萱部队。要指挥这许多庞杂的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抗战，颇不容易。至少，在抗战初期，李宗仁还是有相当名望的，他对待于学忠、张自忠、邓锡侯等将领，都谦和诚恳，至少不是想借抗战来消灭杂牌部队。当时他在政治上还标榜自己是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一边的，他在徐州曾多次向我表示："五路军和八路军都是坚决抗战到底的，五路军也要重视动员群众工作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当时，我是汉口《新华日报》记者，他对我说的有些话，决非无的放矢。

在徐州，成立了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组织各方面的人来做战区动员群众工作。在潢川，五路军办了一个青年抗战训练班（第五战区抗日青年军团），吸引战区青年参加五路军，充实下级干部。李宗仁当时还兼任安徽省主席，设省政府于六安。他改组省政府，任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为财政厅长，又邀请了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到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去担任工作。

李宗仁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离徐州到六安就任安徽省主席时，曾邀《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同志和我同车出发，取道淮北，进入大别山区。当时他对抗战确有几分雄心壮志，在就职时的《告全省民众书》中，曾主张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守纪律的武装部队、土匪强盗和地痞流氓等五种欺压民众的势力，还要禁绝虐待应征壮丁、强拉伕役、妄取民间财物等现象。单是这几项如果切实做到，确是可以巩固后方，增强抗战的力量。可惜，都是空头支票不能兑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是积重难返的。五月下旬徐州失守，五战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司令长官部退守豫南，武汉会战以后，再退至湖北的老河口。这一时期的李、白，已不象徐州会战时的叱咤风云了。一九三九年七月，我经老河口赴襄樊前线，那时李每天在老河口体育场打网球，清闲无聊，而白崇禧到重庆，即为蒋介石收买。何、（何应钦）白（白崇禧）皓电一发，继着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从此李、白也追随蒋介石反共，抗战初期所表现的一些进步倾向完全没有了。

三、两次过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继广州之后弃守。接着，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我和范长江、陈依非（即陈同生）同志以及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干部十几个人离长沙，经衡阳而到达桂林。

当时敌人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而集中其主要兵力，回师“扫荡”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事实上，敌军占领广州以后，并未北上进攻曲江（即韶关），而占领武汉之敌，亦未南下岳阳、向长沙进逼。倒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惊慌失措，自己先放一把火烧了湖南省会长沙，给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动摇了前方军心，直接破坏抗战。

当时的桂林堪称为抗战后方重要的军事、政治基地和文化中心，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各方人士云集于此，难民和军人拥挤街头，人口突然增加。我们到桂林时找旅馆极其困难，尽了最大努力才找到一家小旅馆——高升旅馆，租到一个房间，十几个人席地而卧，白天买菜做饭，过着战时流亡生活。那时桂林每天有敌机空袭警报，有时轰炸、扫射，有

时过境他往，反正在白天我们不得不到郊外的天然山洞去躲避，到傍晚才回城紧张工作。

初到桂林，我和范长江同志曾去拜访广西的党政要人黄旭初、李任仁和陈劭先。黄旭初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耐心地倾听对方的谈话，而自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却概不表态。新闻记者遇到这样的人物，很难采访到重要消息，他可以表面上诚恳接待，给你递烟送茶，谈话达半小时以上，使你仍怅然而返。李任仁和陈劭先先生当时政治倾向进步，对我们开诚相见，告诉我们许多广西内部的情况，这对我们在当地从事新闻工作有极大帮助。此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对我们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是大家历久难忘的。他对广西党、政、军的情况和人事关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瞭如指掌。要了解什么问题，应该通过什么人的关系去找，事先请教他，按照他的意见去办，实践证明总是取得成效的。

青记总会当时已从武汉迁到重庆，为了积极开展长江以南，湘、赣、粤、桂、闽、浙、上海、香港以及南洋各地的会务活动，特在桂林成立南方办事处（简称南办），由陈依非同志担任主任。南办建立以后，旋即领导留在桂林的青记会员，组织会友小组，每周定期举行小组会议，交流工作经验和学习心得。当时建立小组的，计有南方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国新社、《救亡日报》社、《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扫荡报》桂林分馆、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我们举办了几次记者交谊会，不仅加强了记者团结，而且扩大了青记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积极参加当地举办的“伤兵之友”活动和文化界座谈会。从一九三九年开始，举办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积极鼓励青年记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战时新闻工作。

国新社的艰苦创业也从这里开始，先是工作人员集体住旅馆，后来找到了环湖北路十九号的办公地点，即向各地报纸和海外华侨报纸正式发稿。当时急需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一批青年记者，充实工作干部。国新社社长范长江同志要我带高咏、任重和叶蔚孙等三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离桂林赴衡阳，转往广东战区采访。我们曾到潇源、清远、四会、新兴等地，然后沿西江从肇庆到梧州，历时一个多月，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仍回到桂林。同年二月中旬，我应重庆《新华日报》电召，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汽车经贵阳而返重庆。

抗战时期第二次到达桂林，时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底。同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敬爱的周总理领导《新华日报》全体同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应付意外事变，报社实行缩减篇幅，精简人员，疏散一部分同志赴延安或先赴香港，转往海外和苏北新四军驻地。我在二月下旬经贵阳到达桂林，孟秋江同志热情招待我住在国新社，他悄悄地告诉我，长江、韬奋、夏衍等同志都已经飞赴香港，如要及时离桂林到香港，只有找李克农同志想办法。当时李克农同志仍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从容镇定，领导一切工作。我去访问他，尚未说明来意，他先笑着说，估计你日内必到，我早为你作未雨绸缪。你可以先访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将军（号任潮）他一定会派人送你飞香港。果然，李任公热诚接待，请吃饭，买好飞机票，并派他的随从副官送上飞机。在此关键时刻，李任潮将军挺身而出，掩护大批文化人离桂赴港，为人民做了好事。

四、抗战后期的广西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武汉失守之后，为了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随时准备对日妥协受降，转而发动内战。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必然成为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国民党战场上的军事惨败，丢掉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现在回顾抗战后期军事上的危机，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开始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先打河南中原战区，动员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约十二万人，把国民党中央军蒋鼎文、汤恩伯所部五十万人打得狼狈而逃。不到旬日，即攻占郑州、洛阳、叶县、临汝等地，对蓄山地区形成封锁态势。五日下旬，又大举进攻湖南，企图打通粤汉、湘桂两线。六月初，敌军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六月十九日，薛岳所指挥的第四军轻易放弃长沙和醴陵，接着湘乡、安仁、衡山失守，到六月二十二日，敌军已兵临衡阳城下。八月七日，衡阳失守，敌军马不停蹄地向粤汉、湘桂两线继续进攻。九月初，突破黄沙河，打进广西省境。当时全州不仅是军事要地，而且还是西南重要的补给基地，当地囤积大量枪支、弹药和汽油等军用物资。当敌军进攻全州时，守军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竟不战而退，九月十四日敌军唾手而得全州，全部军用物资损失得干干净净。十月九日，敌军四个师团的兵力约九万人，分兵三路直扑桂林。广西部队夏威所指挥的四十六军屡战屡败，几乎成了敌军进攻桂林的向导。十七日敌军追击部队逼近桂林市郊，二十四日敌军已形成对桂林的包围，守军虽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十一日失陷。同一天，柳州亦告失守。

当时，各路败兵和湘、桂两省成千上万的难民，汇成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股无穷无尽的人流向西撤退。公路和附近的小路上都挤满了车辆和人流，那位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因汽车为人流阻塞，也舍车步行，爬山逃难。这种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况，同抗战初期差不多。敌机沿着黔桂公路向逃难人群轰炸、扫射，并以骑兵为先导，跟踪追击，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敌军已越过河池、南丹、六寨和独山，进入贵州省境，贵阳已岌岌可危，重庆也为之震动！

十二月初，蒋介石曾先后派何应钦和张治中到贵阳，布置贵阳撤退事宜。其实，当时敌军仅有一个旅团的兵力，孤军深入贵州山区，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不敷分配，因此，当他们到达距贵阳一百多华里的麻田县时，即停止前进。这时，汤恩伯部队从西安空运到贵阳以南地区，敌军循原路向广西撤退，汤部始尾随推进。这是抗战胜利前夕的军事态势。

值得为我们民族抗战前途庆幸的，是国民党战场之外还有解放区战场，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民兵和人民群众，在这几年同敌军进行“反扫荡”战争中愈战愈强。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抗日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军民关系也进一步改善。到一九四五年初，正规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两百二十万人以上，在战场上抗击敌军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两个战场鲜明的对比，预示了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

抗战胜利以后，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自重庆搭车到贵阳，再从贵阳经过独山、六寨、河池、宜山等地到达柳州，这一路上所见都是残垣破屋，到处是一片劫后景象，在这些

地方要解决食缩问题都极困难，“惨胜”的印象深入脑际。九月初到柳州一看，只剩半片城了，另一半早被敌机炸成焦土。回乡的难民和国民党部队大量涌到，也只能住在帐篷和柳江的木船上，抗战后期广西所受到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三十多年的时间飞逝而过，广西的山水和人物始终在脑中萦迴，写几行抗战前后的见闻，谨供广西文史资料工作者参考和指正。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供稿）

《广西文史资料》

邮 购 办 法

一、读者邮购《广西文史资料》时，在邮局汇款单的“汇款人简短附言”栏内写清楚需要数量，一般不另写信。

二、为避免书籍在邮递途中遗失，邮寄一律挂号，挂号邮资由读者负担，以1—20本为一包计算，另收挂号费0.12元。书寄出二个月后，如果读者还未收到，请来信，本办公室负责向邮局查询。

三、读者汇寄邮购书款，请通过邮局汇出，不要随信夹寄现款或邮票，以免遗失。书款及挂号费，请一次计清，一般不办退款手续。退款汇费由读者负担。

四、凡同一单位购买的集体或个人，最好由单位统一办理邮购，邮购者的姓名，详细地址，要缮写清楚，字迹不要潦草。

五、文史资料第九、第十辑和《马君武诗选》尚有少量存书，欢迎选购。

广西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界

冯英子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一度成为西南文化界的中心，很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曾集中在这个城市，文化、新闻事业都比较发达，同一时期出版的报纸，曾有七家之多。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我曾担任桂林《力报》的总编辑，并为桂林记者公会的常务理事，同当时新闻界同业有较多接触，这里就回忆所及，记下一鳞半爪。

桂林之所以成为当时的西南文化中心，这是同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分不开的。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沿海地区的人民纷纷向内地撤退，开头的目标是武汉、长沙、长江中游的一些城市。随着广州、武汉的弃守和长沙大火的发生，人们又只好向西南地区转移了。

广西当时是在桂系手中，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一体的桂系集团手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特别是桂系集团，由于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积极态度，颇能得到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好感。同时，也由于桂系集团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在桂林不能不受到某些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桂林还不同于重庆，这也成为文化界人士较愿来到桂林的原因。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地理上的原因，从广州，从武汉向后方退却，到桂林也比较方便。在当年，“逃难”也不是一件易事。

桂林最初只有一家《广西日报》，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

一年间，发展到有五家日报，二家晚报，这几家报纸，按其政治态度，大概可作如下排列。

《救亡日报》

首先要提到的是《救亡日报》。这个报纸是周总理关心和领导下创办的报纸，最初在广州出版，由郭沫若出面，由夏衍实际负责。日出四开一张，短小活泼，极受读者欢迎，广州弃守之后，迁到桂林出版，依然是四开一张。

《救亡日报》的社址是桂林太平路十二号，编辑部和印刷厂设在观音山附近。当时的主要负责的是夏衍，编辑部人员中，有林林、华嘉、谢伽因、廖沫沙、赵戈今、高灏、高汾等等，夏衍被迫离开桂林之后，即由林林负责。

尽管《救亡日报》只出四开一张，但在桂林新闻界中，它的威信较高，受到大家的尊重。夏衍当时不仅是报纸的负责人，也是党的社会活动家，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意气自若，应付裕如。记得桂林记者公会成立后，他是常务理事之一，他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最善于说服别人同他合作。所以，当时记者公会的一些活动，很多是以夏衍的意见为意见的。《救亡日报》也显然是进步新闻界中的领袖。实际上，《救亡日报》是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的喉舌，它在广大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也特别为文化界进步人士关心爱护。

《力　报》

在桂林的新闻阵地上，《救亡日报》站在左翼，那么

《力报》就以“中间偏左”的姿态出现的。

《力报》最初出版于湖南长沙，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它积极从事抗战的宣传，态度鲜明，在湖南读者中有较好的印象。郭沫若，田汉等同志，都曾为它写过文章。

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他发现《力报》在湖南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就以资助之名向《力报》投资了五千元，并把他的秘书张稚琴派去作报社的总经理。但不久即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力报》从长沙撤退到邵阳，在邵阳出版。这个《力报》出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为后来作湖南省主席的薛岳以“内部复杂，言论荒谬”，八个字的莫须有罪名非法查封，并逮捕了总经理康德，总编辑严轻愚和主笔冯英子等三人。在这个《力报》被封之前，另一个《力报》却在桂林诞生了，这就是我这里要讲的桂林《力报》。

桂林《力报》的创始人是张稚琴。他原是安徽无为人，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曾在财政部作过小官。后来认识了张治中的弟弟张文心，因而结识了张治中，成为张的秘书。张治中投资《力报》后，派他去作总经理。可是，他同原《力报》的社长雷锡龄、总经理康德的关系搞得不太好，因此他把张治中这笔投资，拿到桂林去另打天下，办《力报》桂林版，并且把《力报》中主要工作人员欧阳敏讷、沈光曾、樊立仲等统统拉到了桂林。这就是桂林《力报》的由来。

桂林《力报》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筹备，租地、造屋、办印刷厂、完全从无到有，从头搞起。社址在社公岩边上，另在西华门附近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办理广告和发行等业务。一九四〇年三月正式出版，由张稚琴任总经理。下设

编辑、经理两部。总编辑先是由欧阳敏讷担任，其后欧阳去江西负责《开平日报》，由冯英子接替，冯走后又由欧阳回任。担任主笔、负责撰写社评的，先后有沈光曾、刘实君、冯英子、邵荃麟、杨承芳、储安平等人，并且还特约杨东莼、宋云彬、傅彬然、张铁生等写一些专论，副刊主编先后有聂绀弩、葛琴、彭燕郊、王西彦等人。参加编辑和采访工作的，先后有樊立仲、龚钦榆、张先畴、邵慎之、姜庆湘、郑时学、吉彭信、王坪、李文、郭茜菲、胡希明、梁维栋等人。经理则由高士林担任。

桂林《力报》日出对开一大张，用当时湖南生产的土纸印刷。它的新闻电讯来源，主要是中央社电讯稿，但却能保持了他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它每天有社评，就当时的国内外大事、时事形势和战局发展，以及当时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它自己的意见。这些社评一般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多所评击。

一开始就由聂绀弩、葛琴主编的副刊《新垦地》，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当时在桂林的进步作家如骆宾基、司马文森、黄药眠等等，绝大部分是《新垦地》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很受读者的欢迎。

此外比较多的刊载自己的人撰写的专论，特约通讯，并大量采用国际新闻社的通讯稿，特别是来自各战场的战地通讯，以满足读者关心战局的需要。

由于它有以上的特点，所以出版不久，《力报》就在桂林站稳了脚跟，一直到抗战后期湘桂战役发生，桂林陷于敌手之后，才被迫停刊。

桂林《力报》社，当时有好几个共产党员，邵荃麟、葛琴、聂绀弩、张先畴等都是，邵是主笔，葛，聂负责副刊，张是新闻编辑，因此决定了《力报》的政治态度。当时《力报》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署在桂林设立的新闻检查处处长周永沣的纠纷最多，他曾经几次向张稚琴施加压力，要张把我弄走。当然，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力报》，不过那已是周永沣已经离开桂林之后的事了。

《广西日报》

《广西日报》是广西省政府的机关报，说得更具体一点，它是桂系的报纸。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桂系集团对抗日战争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们同蒋介石之间，既有共同利害，也有各种矛盾，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时的局势下，保持了比较中间的态度。即是说，只要不触及桂系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跟着蒋介石走的，《广西日报》的社长先后有韦挚唐、黎蒙等人。韦后来去作什么政治部主任了，黎蒙大概是李宗仁的亲戚，广西解放之后，他在香港办《新生晚报》。总编辑莫宝坚，也是桂林记者公会的常务理事，后来听说去广西大学教书去了。采访主任张洁，工作人员中，有刘火子、韩北屏、胡乃琨、陈子涛等人。陈子涛是以练习生身份进入《广西日报》的，后来是“《文萃》三烈士”之一。原来在上海搞报的姚苏凤，那时也在桂林，《广西日报》把他找去编了一个时期的副刊。那时各报刊利用副刊作竞争是很激烈的。

《广西日报》日出对开一张，因为它是广西的官方报纸，各机关都要订一份，使它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发行数量。

因为有官方作后台，社址也是比较好的。

《大公报》

桂林《大公报》发行于一九四〇年的秋天。由胡政之亲自筹备出版。

抗战前，《大公报》原在天津出版，其后又出了上海版。随着时局的变化，天津版迁到了汉口，上海版则迁到了香港。汉口弃守之后，汉口的《大公报》又迁到了重庆。这时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大公报》也赶着到这里争一块地盘。出版桂林《大公报》。

早在一九三六年时，《大公报》的胡政之就到过一次广西，在《大公报》上宣传过李、白、黄在广西的那一套做法，以此结识了李、白、黄。一九四〇年，胡政之就凭着这一点渊源，到桂林筹备出版《大公报》了。

桂林《大公报》由重庆《大公报》馆领导。筹备之初，派蒋荫恩作编辑主任，王文彬作副经理。出版不久，另派徐铸成作总编辑，金诚夫作经理。当时的工作人员中，还有张蓬舟、陈凡、罗承勋、曾敏之、钱庆燕、吉彭信（此人原在力报，后转入大公报）等。当然，在政治态度上，桂林《大公报》同重庆《大公报》是一致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大公报》的一批人物退到桂林。人多了，怎样安排？这样，《大公报》又另外出版了一份“晚刊”，四开一张，由从香港来桂林的杨刁樵、马廷栋负责，罗承勋主编副刊。《大公报》出版到桂林陷敌时为止。

《扫荡报》

《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看它的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